



图像时代的精神寓言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
神话、艺术与思想

曲 枫◎著

TUXIANG SHIDAI DE JINGSHEN YUYAN
ZHONGGUO XINSHIQI SHIDAI DE
SHENHUA YISHU YU SIXIANG

黑龙江人



图像时代的精神寓言

曲
枫◎著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
神话、艺术与思想



TUXIANG SHIDAI DE JINGSHEN YUYAN
ZHONGGUO XINSHIQI SHIDAI DE
SHENHUA YISHU YU SIXIANG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像时代的精神寓言: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神话、艺术与思想 / 曲枫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7.6

(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 崔向东主编)
ISBN 978-7-207-11061-9

I. ①图… II. ①曲… III. ①新石器时代—艺术史—研究—中国 IV. ①J12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4827 号

责任编辑:姚虹云

封面设计:张 涛

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崔向东主编

图像时代的精神寓言——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神话、艺术与思想

曲 枫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11061-9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辽宁省教育厅项目“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WW2016002)

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研究院资助出版

“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总序

崔向东

在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一些特殊的地理区域持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谓“历史的地理枢纽”。这种枢纽有时是点、有时是线(廊道)、有时是面(区域),民族走廊和丝绸之路就是典型的“历史的地理枢纽”。

“民族走廊”最早由费孝通先生提出,很好地诠释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民族走廊既是地理廊道,也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民族走廊是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商贸往来和边疆控制的重要场域。“丝绸之路”由德国学者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具体指称汉代由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西域、中亚,远抵罗马帝国的一条中西交通线路,后泛指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通线。丝绸之路本意是贸易交通道路,但被赋予了持续的更为广阔的地域和广泛的意义,发挥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和“人类文明运河”作用。

民族走廊和丝绸之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相似的功能和作用。凡是民族走廊,也必然是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之路,二者常常是一体二名。民族走廊联系着中原和边疆,丝绸之路沟通着中国与世界。我国学界一般讲“三大民族走廊”,即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而东北亚地区的民族走廊和丝绸之路则一直被学界忽视。

一、“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的形成和路线

中国东北处于东北亚的中心区位,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历史上以中国东北为核心,很早就存在着以玉石、黑貂和丝绸等为符号的多条民族走廊和贸易之路,这些走廊和贸易之路成为东北亚民族走廊和丝绸之路的基础。历史上东北亚民族走廊和丝绸之路主要有:

1. 辽西走廊

结合考古学文化、自然地理和历代行政区划,人们通常把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巫闾山以西和七老图山以东的区域界定为辽西。辽西地区水系和山脉交错,河谷两侧山脉夹峙,中间一线蜿蜒逶迤,形成多条交通廊道,统称为“辽西走廊”。辽西走廊的南端连接着华北地区,直达中原;北端连接着广袤的东北大地,可进入到东北亚腹地,是沟通东北与中原极其重要的民族—文化廊道。辽西古廊道主要有四条,它们分别在不同时期先后形成。一是古北口——平刚——柳城道;二是卢龙——平刚——柳城道;三是无终——平刚——柳城道;四是傍海道。前三条古廊道形成较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已见雏形。辽金以前,这三条道路发挥着重要作用。辽西傍海道是由蓟出发,经无终、令支东行到临渝关,出临渝关沿渤海岸向东北行进抵达碣石。从碣石东北行经今兴城、锦州进入辽东。辽金时期,傍海道(碣石—锦州段)得到进一步开发,地位逐渐提升。明清时期,傍海辽西走廊“扼山海之冲要,为京师之樊篱”,成为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

2. 北方草原丝绸之路

“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位于北纬 40° 至 50° 之间的欧亚草原地带,是最早的横贯亚欧北部草原的古代文化交通线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由蒙古高原向西经过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北部,直达喀尔巴阡山脉的草原地带;向东延伸至中国东北进而深入到东北亚腹地。从

中亚北部向东,草原丝绸之路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经阿尔泰山南麓进入阴山,沿阴山、燕山北部穿越蒙古高原直达黄、渤海沿岸。北部经阿尔泰山北部进入漠北(蒙古和俄罗斯西伯利亚草原),直至中国东北,并和黑龙江水道相连,通往东北亚腹地。从不同民族、地域和物产视角看,“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北道也被称为“黑貂之路”或“皮毛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主要沟通北方、东北游牧渔猎民族与中亚、西亚的交往。从不同民族的视角依据不同物品而有不同命名,充分说明这条道路的多民族和国际共用性质。它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共同联系纽带。

3. “海西东水陆城站”路

“海西东水陆城站”路亦称“东北亚水陆丝绸之路”。“海西”即元岭北行省以东、日本海以西,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古代黑龙江流域和库页岛一带民族众多,唐以来与中原一直保持往来。辽金时期通过“鹰路”与黑龙江下游保持联系。元朝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在女真聚居之地设置“海西辽东提刑按察司”,开通驿路,设置驿站,直达黑龙江下游奴儿干“东征元帅府”。明朝为确保东北边疆“使命往来”,在黑龙江下游地区设立“奴儿干都司”,在原有驿站基础上开辟“海西东水陆城站”交通线,“置辽东境外满泾等四十五站”。“海西东水陆城站”作为国家所设驿路,穿行于白山黑水之间,南与辽西古廊道相连,明代大量“丝绸诸物”由辽东“丝关”开原(今辽宁省开原)转经“海西东水陆城站”运往东北腹地乃至库页岛、北海道。“海西东水陆城站”路从满泾站渡过鞑靼海峡便进入“苦兀”(今库页岛)北端,再南下到达“苦兀”最南端白主,由白主南下越过宗谷海峡抵达北海道。上述这两条道路相连,因此也被称为“东北亚水陆丝绸之路”。

4. 海上丝绸之路

一般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常指从中国东海南下至印度洋的海上贸易之路。实际上在东北亚也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即从渤

海、黄海到日本海这一航路。“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从胶东半岛经庙岛群岛到辽东半岛的航路;二是从辽东半岛向东“循海岸水行”的航路;三是环日本海的“沧波织路”。三段海路在不同历史时期构成了“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

5. 东北亚洲际陆桥与冰上走廊

在亚洲和北美洲之间,存在一条最短的洲际海上通道,即俄罗斯楚科奇半岛和美国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亦称之为“白令陆桥”或“冰上走廊”。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美洲土著民族的祖先是在1万至3万年前通过白令海峡的陆桥由亚洲迁徙去的。近1万年以来,“白令陆桥”才被海水隔断,但由于这里气候寒冷,每年10月至次年3月几乎半年时间海平面处于“有不释之冰”的结冰状态,架起一座天然的“冰桥”,为人和动物的迁徙提供了便利条件,可谓名副其实的“冰上走廊”,成为亚洲与北美洲的古人类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二、“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民族走廊与丝绸之路往往是重合的,这是由地理环境、民族分布和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从交通角度看,民族走廊与丝绸之路具有相同的功能和作用。东北亚走廊与丝路是“历史的地理枢纽”,它连接南北、沟通东西,在文明起源、民族迁徙、文化交流、经贸往来、边疆控制、东北亚文化圈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演进中具有重要地位。

1. 民族走廊与文明起源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文明因素的传播与吸收,都依靠交通,交通走廊为文明起源提供了条件,在文明起源和社会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交通与文明起源是共生互动关系,彼此促进。“辽西走廊”所在的辽西地区是中国古代文

明起源地之一,最早出现文明曙光。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以辽西古廊道为骨干的内外交通网络。红山文化与周边地区不同文化通过辽西古廊道相互传播、交流,不断吸收周边和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诚如学者所论,“红山文化时期,既是‘彩陶之路’的东端,又是‘玉石之路’的起点,是沟通东西方的‘彩陶之路’与环太平洋‘玉石之路’的交汇点,东西方文化因素在这里高度融合。”辽西古廊道实现了辽西地域与周边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加速了辽西地区古代文明起源进程。

2. 族群迁徙、民族融合与多元一体化

民族走廊与丝路在民族迁徙和融合上起着重要作用,这种融合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东北古代民族众多,分属肃慎、秽貊、东胡和华夏四大族系,这些民族沿东北亚走廊与丝路频繁迁徙流动。纵观古代东北地区民族分布和迁徙的演变历程,东北亚走廊与丝路是民族迁徙、交流与融合的纽带,在这一纽带的连接下,东北地区成为族群迁徙融合的重要场域,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民族在文化认同上交集越大,文化的冲突就越小,从而形成文化的一致性,最终由民族心理上“非吾族类,其心必异”而实现“车书一家”。

3. 经贸往来与经济联系

在不同历史时期,东北各民族通过走廊与丝路实现与外界的经济联系。由于东北亚走廊与丝路连接地区的不同,贸易的物品亦各具特色。辽西走廊沟通东北与中原,中原的物品输出主要有丝绸、铁器、书籍等。在“海西东水陆城站”路沿线(“虾夷锦”之路),清朝通过“赏乌绶”和民间贸易保持同黑龙江中下游的赫哲、鄂伦春、费雅喀等少数民族的联系。日本北海道的虾夷人与黑龙江下游少数民族进行“山丹”贸易,虾夷人用海货、毛皮等获得中国丝绸、粮食。东北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进行贸易,中亚、西亚各国的金银器、玉石、琥珀、玛瑙、珊瑚、毛织品、香料、玻璃器等由西而东进入

东北,并传到新罗,远至日本。东北输往中亚西亚的物品主要有金、洁银、零碎丝绸、黍种、肥马、牡马、黑貂、苍栗鼠等,碎绸和黍种是输自中国的产品,而黑貂和苍栗鼠等则是东北亚森林狩猎民族的特产。在走廊与丝路的沟通下,通过贸易互通有无,东西南北物产汇聚于东北,实现了农耕、游牧、渔猎民族经济联系和需求互补。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建立了区域与世界经济网络,使彼此相互依赖、互补的区域经济建立起内在联系,促进了边疆与内地、中国与国外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发展。

4. 文化传播与技术交流

走廊与丝路在文化传播、技术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物品与人员在走廊与丝路上的迁移流动和贸易往来,各种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也相互传播,反映了走廊与丝路在文化交流中的巨大融合力。通过东北亚走廊与丝路,实现了文化与技术双向远距离传播与吸收,外来文化与技术在不断构建、重塑东北地域文化,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一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这种双向互动交流强化了东北亚文化的内在联系性。另一方面,在这种双向互动交流中,多民族文化融合与并存,促进了东北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

5. 国家认同、边疆控制与边疆内地化

一般而言,走廊与丝路的形成有其自然环境基础,但更受政治、经济需要的影响。有些走廊与丝路突出的是民族往来和经贸交流,而有些则突出的是国家控制,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在东北亚走廊与丝路体系中,辽西走廊最为基础,历代中原政权通过辽西古廊道实现边疆控制和国家、疆域一体化。明清时期,辽西走廊向东北与以开原“丝关”为枢纽的丝路连接,进入“海西东水陆城站”路,直达黑龙江下游、库页岛境内。向西进入蒙古“兀良哈”部,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之路衔接。向东与朝鲜的“朝贡道”相连,“历辽阳、广宁,入山海关,达京师”。以辽西走廊为核心,构成了支撑古代东北亚藩属朝贡

体系的交通网络,促进了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与内地的“同质化”。东北亚走廊与丝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国家意志,强化着“国家”观念,维护着藩属朝贡体系,有利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边疆“内地化”进程。

6. 东亚文化圈的形成

东亚文化圈一般认为是以文字、儒教、律令制度和佛教为核心的同质文化。东亚文化中有许多共同因素,这种共同文化因素是和东北亚走廊与丝路密不可分的。在古代东亚文化圈,无疑汉文化是东北亚区域的主体文化。中国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东亚的影响尤为突出,而东北亚走廊与丝路在这个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的儒学对朝鲜、日本等国产生巨大影响,朝鲜、日本使用中国的文字、历法、制度、礼仪等,这些都表现出与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和共通性,形成同质文化圈。

三、“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设想

2015年,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建设中、蒙、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东北被纳入到“一带一路”战略中。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在“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既要借鉴其他民族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的成熟做法,更要有创新和突破。

1. 以走廊与丝路为视角构建学术框架与体系

以民族走廊和丝绸之路为视角探索中国东北、东北亚地区边疆与民族、经济与社会、历史与文化,这是研究“范式”的转换。要改变过去对问题的“点”的研究,由点到面,由静态转变为动态,体现联系、开放、互动的观点。以走廊和丝路为视角,构建新的学术框架和体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对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传播与融

汇、古代文明起源、边疆控制与国家认同、边疆内地化进程、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东北亚区域合作与经济一体化、东北亚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线性文化遗产开发与利用等许多重大问题做出新的解释,从而夯实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理论体系的基础,自主建构该领域的中国学术话语权。

2. 强调问题意识,加强多学科合作

“民族走廊”是民族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但它又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学问题,它涉及各个学科和领域。走廊与丝路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理—文化系统或人文场域,尤其在“一带一路”视域下,人们赋予走廊与丝路研究以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宽阔的领域,这绝非局部视野可以覆盖,亦非单一学科所能胜任,应当是国际视野下的跨学科、跨地域、跨国别的综合研究。要把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结合起来,学科应当从属于问题,注意以问题意识统领学科,以问题意识带动学科整合,淡化学科边界,强化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交叉,避免研究对象的碎片化,从而实现跨学科、跨区域、跨国别的学术合作和整体性、综合性、联系性的思考。

3. 理论与方法的多样化

走廊与丝路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遗产学等诸多学科内容。同时,由于各民族走廊与丝路在地理环境、气候类型、历史传统、民族分布、文化传统和国际地缘等方面的差异性,其研究内容也必然有差异,从而体现其独特性。这些都决定了走廊与丝路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多样性。

4. 以走廊和丝路为视角进一步推动东北区域历史与文化研究

中国东北在东北亚区域处于核心地位,这不仅是在地理位置上,更体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东北在东北

亚地区历史发展进程中都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记和影响。从交通角度讲,东北亚走廊与丝路也是东北交通骨干,它联系沟通着周边民族与国家。在民族走廊和丝路视域下,将东北历史、文化置于更大的地理空间、文化场域、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下去思考,将东北与东北亚历史发展联系起来,突破仅限于国内的狭窄视野,进入到一种世界话语的文化表述空间,有助于深刻认识东北历史发展与周边国家的互动性和文化的民族特性。这样的国际视野和背景将会引发更多新的思考,利于避免静态的结构分析,进而在互动的脉络中拓展地域研究的新视野,对于重新认识东北边疆与民族、历史与文化、社会与经济和东北亚各国历史发展等都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5. 开展多领域研究,为东北再振兴提供学术与智力支撑

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因此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要兼顾。东北被纳入到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古代“民族走廊”正向当今“经济发展带”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转型,东北亚走廊经济带逐渐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北亚走廊与丝路研究要和现实结合起来,从现实中发现历史问题,从对历史问题的回答中为现实提供借鉴和启示。要把握时代脉搏,根据时代需要拓展新的领域和空间,展开具体课题研究,如民族走廊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民族走廊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东北亚各国区域合作及经济一体化等,要将学术研究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结合起来,为东北再振兴和国际区域合作提供智力支撑和文化依据。

6. 以“文化线路”推进民族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线性文化遗产”(文化线路)强调的是特定地域空间内文化遗产的线性分布、内在联系及其相互影响,它反映的是文化多样性和整体的跨文化意义。民族走廊与丝绸之路经过的都是民族地区,拥

有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民族走廊与丝路将沿线及周边地区多样性的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连续的线性“文化载体”。历史上东北亚走廊与丝路是一条极具特色的民族历史文化沉积带,众多民族都在东北亚走廊与丝路上留下了民族文化遗迹和景观,这些遗迹、景观是历史的见证,也是走廊与丝路文化多样性和整体的跨文化体现。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很多民族文化遗产被毁坏散失,一些独特的民族文化遗产日渐消失。因此,从“文化线路”视角充分发掘文化遗产的内涵、特点,抢救和传承民族历史文化,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东北亚民族走廊与丝路研究的当务之急。同时,为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提供依据,打造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实现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也是走廊与丝路研究中最具现实意义的内容之一。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以贯穿于东北亚区域内的民族—文化—经贸走廊为视角,多学科、多角度地对东北亚区域内的中国东北地区边疆与民族、历史与文化、经济与社会等作连续、开放、互动、整体性的认识与研究,希望能推动东北亚民族走廊与丝绸之路的研究,为东北亚各国的政治合作提供历史依据,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深入交流与合作,进而寻求共同利益,推动共同发展,为建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崔向东,历史学博士、教授,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研究院院长、环渤海文明研究院院长)

真理在路上

(代序)

曲枫先生的《图像时代的精神寓言——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神话、艺术与思想》是一部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神话、艺术与思想的思考与探索的考古学著作,不过说是一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术史的理论检视也是可以的;或者从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角度来看,该书也可理解为基于考古资料来研究史前宗教,也就是史前认知考古学。

英国考古学家伦福儒说,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是指考古材料发现的历史,也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而是包括考古学思想在内的发展历史。历史证明,难度最大的发展是观念的进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的《考古学思想史》1989年出版后好评如潮的原因(陈淳语)。我们国家的考古学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在考古材料方面,可以说已经是蔚为大观了,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相应的研究,也就是说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发展,却远远不能满足材料的需求。材料再多,也不能推进考古事业的发展;而思想的每次变化,都将意味着一个新的天地。对我国上世纪中叶以来各种史前研究理论做一个即便是简要的学术回顾与评述,不仅及时,更是急需。作者没有陷于从学术流派和理论思潮的角度去总结的体系学术史研究,而只是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念加以评述,使之更具针对性。譬如图腾问

题,上世纪这曾是中国史前研究的一把万能钥匙,举凡不能解释的,最终都归类图腾而加以了结。不过到了90年代初,张光直先生指出用图腾来解释考古材料的问题所在;后来90年代中期,俞伟超等人撰文评析所谓图腾崇拜的虚幻性;而该书作者则以皇帝的新衣来对图腾加以否定。从对图腾制理论的肯定到最后被否定(应该是解构而非否定),与其说反映了考古学领域对理论和概念的认知过程,不如说是折射出整个社会学术思潮的演化过程。

关于这种价值体系的判断与讨论,实际上是西方现代扩张的意识形态或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体系指导下的宏大叙事。后殖民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解构(并非否定)现代性宏大叙事,诸如理性、自由、民主、文明、进步之类具有普世意义的观念;反对“元解释”和“文本意义”,在思维在哲学上抱持一种对于逻辑性观念与结构性阐释的“不轻信”和“怀疑”的态度,全面批评由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特别是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论为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西方现代性留给我们的思想陷阱,不在观念的本身,而是在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你将启蒙哲学与解构西方现代扩张历史对读,就会发现知识与权力危险的合谋。后殖民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解构西方现代性宏大叙事,为西方现代性精神解构提供了辩证的否定面,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西方现代性的缺陷,又可以发现其活力(周宁语)。关于图腾制的认知过程即其一例:从肯定到否定,从建构到解构。

萨满教理论也是上世纪西方流行的史前研究理论。上世纪初德国学者格莱纳(F. Graebner)、施密特(W. Schmidt)等人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提出文化圈理论,认为萨满教只是一种极地文化现象。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鲍泰(M. Bouteiller)和美国学者艾利亚德(M. Eliade)分别出版了《萨满教和巫术问题》和《萨满教——古代迷狂术》两部书。艾氏的《萨满教》将世界各地的萨满教加以系统地比较研究,分析总结了全世界范围内萨满教的基

本特征如宇宙观、神话观、迷狂术、灵魂观及其祭祀仪轨、继承制度、崇拜形式等,认为萨满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原始宗教形态。德国的劳梅尔(A. Lommel)也认为整个世界的古代文明都是萨满式文明,萨满教是曾经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流行的唯一的原始宗教。美国的坎普贝尔(J. Campbell),以及前苏联的奥克拉德尼科夫(A. P. Okladnikov)等人,运用萨满教的思想观念来解释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原始文化和原始艺术。张光直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也是以萨满式文明为特征;李约瑟博士认为汉代的巫、覡、仙等均均为萨满,而且汉代“羨门”一词,实为萨满的最早译音。

上世纪的80年代末,南非的路易斯-威廉(J. D. Lewis - Wilians)等人提出了新萨满主义理论,运用南非布须曼人的人类学材料和神经心理学认知模式来解释南非岩画和欧洲洞穴岩画,同时也解构传统的萨满教认知模式。萨满教是不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宗教形式、萨满教的迷狂是脱魂还是凭灵、三界世界观的表象形式等等不再是被人关注的焦点,代之以神经心理学的各种认知模式,如该书中所涉及的“蛙纹或神人纹”、太阳光芒、动物身上的重圈纹和涡纹、“X”光风格的人骨架等等。

人类的认知永远不会停止,换句话说,真理永远在路上。后殖民和后现代主义研究并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关注自我意识,即自我指涉性的思想方法。它对西方现代性知识体系,既是摧毁性的,也是建设性的。摧毁性表现在其普遍怀疑主义的解构性批判上,建设性则表现在西方文化自身包容对立面的辩证的开放性上。折射在考古学科中,这就是后过程考古学,亦即认知考古学。久矣夫!我们的眼睛只盯着考古学文化的物质层面,而完全忽略了精神领域。世界无疑是物质的,包括人类文化。不过人类文化区别于自然界正是由于物质文化后面的人类精神。文化是物质的,然而,是根据人类的精神而构成的。准确地说,文化是观念的产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过程主义才被称为认知考古学,而研究考古学文化的精神层面正是后过程